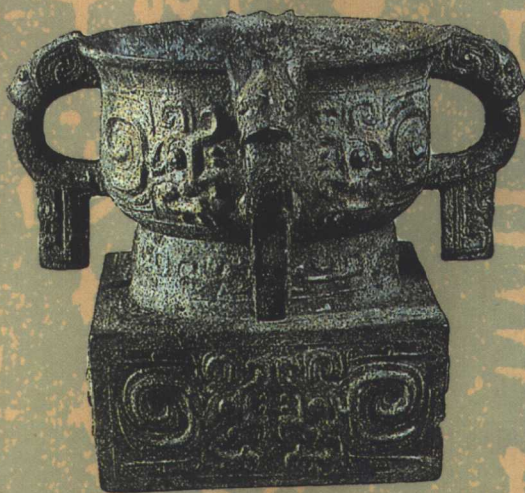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輯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 編

古文字研究

第二十輯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古文字研究. 第20輯/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 - 北京: 中華書局, 1999

ISBN 7-101-02450-5

I. 古... II. 裘... III. 漢字: 古文字-研究-文集
IV. H121-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57539 號

責任編輯: 邱 璐

裝幀設計: 王增寅

古 文 字 研 究

(第二十輯)

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北 京 新 興 膠 印 廠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frac{1}{16}$ · 22 $\frac{1}{2}$ 印張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定價: 36.00 元

ISBN 7-101-02450-5/H · 161

2000. 9. 12

弘文書店

No. 1645223

目錄

試論花園村遺址出土的獸骨刻劃文字（鄭洪春 穆海亭）	一
山東莒縣陵陽河陶文的發現與考釋（蘇兆慶）	一一
修定武乙征召方日程（加 許進雄）	二〇
甲骨新綴廿二例（黃天樹）	四四
西周共王時期銅器的初步清理（劉啟益）	五五
試論習鼎銘文中的幾個問題（陳連慶）	八五
班簋銘文釋讀的一些問題（孫稚雛）	九八
戰國兵器銘文選釋（何琳儀）	一〇七
邵鐘銘文補釋（湯餘惠）	一三〇
荊門包山楚簡論述（劉彬徽）	一三八
《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補正（李零）	一五四
釋「木月」「林月」（裘錫圭）	一七九
釋兔（曹錦炎）	一八四
殷墟卜辭「甘」「日」字用法縷析（周本良）	一九二

釋「索」(施謝捷)	一〇一
甲骨文「山」「火」辨——兼釋𡵓、𡵔(羅運環)	一二二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徐寶貴)	一三四
《汗簡》、《古文四聲韻》中之《義雲章》「古文」的研究(黃錫全)	一四二
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姚孝遂)	二六三
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張桂光)	二八六
古文字中的借筆字(吳振武)	三〇八
上古漢語史上劃時代的標誌——春秋載書(陳永正)	三三八
清代傑出的古文文字學家吳大澂(陳煒湛)	三四六

試論花園村遺址出土的獸骨刻劃文字

鄭洪春 穆海亭

一

一九八六年三月，陝西考古研究所鎬京考古隊在長安縣斗門鎮花園村一座大型西周宮室建築基址的西側，擴掘了四十個探方，面積共四百平方米，發現了一處文化層堆積厚、包涵豐富的客省莊二期文化（即陝西龍山文化）遺址。而西周宮室建築基址有的地方則疊壓其上，有的地方則打破其關係。在這處陝西龍山文化遺址內，發掘了呂字形房址二座，袋狀灰坑和有螺旋式台階的窖穴二十三個，墓葬二座，出土了大批陶、石、骨質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別是發現了十多件獸骨和骨器上，有刻劃的痕迹，有的是簡單的符號；有的則是原始文字。其字體小如蠅頭，筆劃細若蚊足，刀鋒古拙，字迹清晰。有的形體結構，與殷墟甲骨文相近。這一重大發現，對研究中國漢文字的產生，黃河渭水流域文明的起源問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當年五月一日《光明日報》頭版以《西安出土一批原始時期甲骨文》為題，作了簡明的報道，隨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陝西省和西安市的電台、報紙，也都相繼播發和轉載了這則新聞，立即引起了國內外專家學者的注目和震驚。這年九月底，在山東省長島縣召開的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六屆年會上，我們在《談花園村遺址出土獸骨上的刻劃符號》一文中，簡介了這批獸骨的出土情況，闡述了自己的幾點看法，並且展示了部分實物和照片。與會者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和爭辯，大多數認為獸骨上的刻劃，是人工有意刻上去的，有的認為這些刻劃應屬文字，可以釋讀，並指出一枚肋骨上刻劃的蝎形，就是「萬」字。

這年年底，又出土了幾件帶有刻劃的獸骨，其中一枚骨筭上刻有兩個字，第一個字就像雙臂左右平伸、雙腳叉開、正面而立的人形。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們帶着幾枚獸骨，前往北京，向國家文物局匯報了工作。二月二十四日，在國家文物局的主持下，召開了關於這批獸骨刻劃文字的鑒定座談會。與會者

有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古文字學家約二十多人。不少人認為這是文字。胡厚宣先生說：「這是人工刻上去的，是有意刻上去的，其中一個就像人字嘛！」也有的人提出質疑。通過這次座談討論，對於我們深入研究獸骨刻劃文字，是大有收益的。以後，八七年三月十九日《光明日報》以《西安又出土一批原始時期甲骨文》為題，又作了報道。《陝西日報》、《西安晚報》也再次相繼轉載了這則新聞。二年來，我們清理出帶有刻劃的獸骨和骨器共十二枚。本文對它們出土的情況作一說明；並對其特徵、意義談點不成熟的看法，不妥之處，敬希方家指出。

二

這些帶有刻劃的獸骨和骨器共十二枚，其中獸骨有肋骨一、骨片三、獠牙一、鹿角一；屬於骨器的有骨筭三、骨錐一、骨針一、骨鏃一。分別簡介如下：

T 18 H₁ : 01 骨筭殘長 5.6、徑 0.4 釐米，色淡黃，出土位置為 $90^{\circ} \times 45^{\circ} \times 100$ 米，在骨筭尖端刻有一個字，不識。它筆劃繁多，線條清晰，從放大的照片上，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筆劃的先後順序和重疊關係。

T 18 H₁ : 02 骨筭殘長 8.4、徑 0.8 釐米，出土位置為 $20^{\circ} \times 40^{\circ} \times 100$ 米，色灰白。在骨筭根部，直行刻有兩字。第一個字像雙臂左右平伸，雙腳分開，正面而立的人形，可釋讀為「大」字。第二個字是一橫，下面有一豎、一點，作「丁」形。不識。

在這兩字之旁，還有一些微細的刻劃，無法辨認。

T 17 H₅ : 03 肋骨長 11.5、寬 2.2、厚 1.4 釐米，出土位置為 $40^{\circ} \times 60^{\circ} \times 100$ 米。色深褐，在肋骨凹面刻有

三字，其中一字像蝎之形，可釋為「萬」字。其他兩字，難於辨認。

T 17 H₅ : 04 骨片長 6.4、寬 2.6、厚 1.3 釐米，呈三角形，色淡黃，有深棕色的斑點，在骨片正中，刻有一字，像側身垂手而立的人形，可釋為「元」字。

T 20 H₁ : 05 獸牙長 4.5、寬 1.1、厚 0.5 釐米，它是一枚獸類的獠牙，色白，牙齒兩端燒成焦黃色，兩側牙面上，有成雙作對的灼窩，共五對十個。其大小似米粟，灼窩很淺，牙面刻有三橫和二橫，類似今天的「三」和「二」兩個數字。

T 19 H₁ : 06 骨錐長 6.8、寬 1.3、厚 0.4 釐米，色深棕。在骨錐橫斷面上，和側面，有刻劃幾條，但

無法辨認。

丁 20 H₅ : 07 骨片長 84、寬 1、厚 0.3 厘米，色淡黃，在骨面上刻有二字，有一個類似長尾蟲的形象。另一個綫條繁密，無法辨認。

丁 19 H₇ : 08 骨片長 2.9、寬 1.9、厚 0.3 厘米，色黃褐，骨面刻有一字，作「兀」形。與「兀」字近似。

丁 19 H₃ : 09 鹿角長 9、徑 1.3 厘米，色黑褐，刻劃較多，但筆劃纖細，無法辨認。

丁 19 H₇ : 10 骨鏃長 7.3、寬 1.2、厚 0.4 厘米，色深褐，刻有一符號為「冂」。

丁 18 H₄ : 11 骨針長 12.3、徑 0.4 厘米，色淡黃，在骨針尖端刻有兩個「八」的數字。

丁 19 H₃ : 12 骨筭長 12.5、徑 0.5 厘米，色深褐，在骨筭根部刻有一個字，不識。

這些帶有刻劃的獸骨和骨器，具有以下特徵。一、為了便於刻劃和長期保存，以免腐朽，這些獸骨和骨器，可能是經過脫脂、防腐的處理。因而，儘管它們埋入地下四千年左右，但出土後，仍然是質地十分堅硬，表面瑩潤光亮，與一般食肉之後而丟棄的獸骨，截然不同。二、這些刻在獸骨和骨器上的原始文字，行筆的先後順序和相互重疊關係，是清晰可辨的。如編號 02 骨筭上的第一個字，「大」字的行筆順序是：人、九、九、共四劃，一橫劃疊壓在兩豎劃之上。由此可見，這勿容置疑是人工有意刻劃上去的。三、這些獸骨和骨器上的刻劃，有的是簡單的符號，或者數目字，有的則是原始文字，其形體結構，與殷墟甲骨文有淵源關係。如編號 03 的「萬」字作「𠂔」形，而殷墟一期甲骨文作「𠂔」形；編號 02 的「大」字作「𠂔」形，而殷墟一期甲骨文作「𠂔」形。兩者相比，頗為雷同。因此，我們認為，花園村遺址出土的獸骨刻劃文字，不僅是開創了在獸骨上進行刻劃的先河，而且，也是殷墟甲骨文的始祖。它應屬於最早的原始文字。

三

花園村客省莊二期文化遺址出土的這些獸骨刻劃文字，儘管我們目前對其中有的文字還無法辨認，釋讀有誤，或者不能理解有些文字的含義，但是，它們的發現，對研究我國漢文字的產生、中國文字的起源，有着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第一，它是我國最早的原始文字之一。它提供了古文字的珍貴資料。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是人類社會進行交際的重要工具。它是原始氏族末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人類歷史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

我國漢文字究竟產生於何時，這一直是個爭論不休、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些專家學者認為，早在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時代，或者在四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時代，已經有了文字的萌芽。如郭沫若先生曾提出，西安半坡遺址彩陶口沿上的刻劃符號，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①。于省吾先生曾將這些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對照甲骨文、金文，作了釋讀，並指出：「這種陶器上的簡單文字」，考古工作者認為是符號，我認為這是文字起源階段所產生的一些簡單文字^②。李學勤先生也同樣認為：「這類符號中的一部分，結構複雜，已經超出了刻劃符號可能的範圍」^③。唐蘭先生對山東莒縣陵陽河遺址出土陶尊上的刻劃符號，逐個作了釋讀，並指出：「大汶口文化的文字，是區別野蠻與文明的重要標誌，是我國文明的始祖。它們有的像自然物體，有的像工具和兵器，有的代表一種語義和意符，是已經規格化的進步文字」^④。袁錫圭先生說：「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應該已經不是非文字的圖形，而是原始文字了」^⑤。總之，我們認為這些觀點都是將文字產生的時代，估計過早。

有些專家學者却認為，商代的甲骨文才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如徐中舒、唐嘉弘兩位先生說：「中國象形文字出於商代後期（盤庚、武丁以後）的「卜」人集團」^⑥。孫華先生也認為：「中國漢文字形成於商代，殷墟甲骨文是最早的漢文字，在甲骨文以前的一切圖形和符號都是尚未與語言結合起來的原始記事的圖形和符號，而不是文字體系的構成單位——單字或單詞」^⑦。這些觀點，對漢文字的產生時代，估計過晚。

我們認為仰韶文化半坡遺址彩陶口沿上的刻劃符號，是當時人們在製做陶器時，隨手刻劃的記事符號，它代表一些具體的事件，而不是詞語；它只是記載事件，而不是記錄語言，也沒有固定的形、音、義。它的含義，只有靠刻劃者的表述，別人是無法知曉的。因此，認為那些彩陶上的刻劃符號是簡單文字，是難於令人信服的。對此，高明先生早有專文駁議^⑧。李先登先生也撰文指正^⑨。

大汶口陶尊上的「」這一刻劃符號，于省吾先生釋讀為「旦」，唐蘭先生釋讀為「旦」，李學勤

先生釋讀為「吳山」。總之，不少專家都認為是文字。但據發掘報告記載，這些陶尊形體碩大無朋，數量寥寥無幾，僅出土於近二百座墓群中的四座，並不與一般陶器為伍，往往與豬頭放在一起。^⑩因此，有人推測：「這種大型陶尊似乎總與社會上受尊敬者、富人和權貴結有不解之緣。陶尊並非日常生活用具，可能與死者生前的地位有關，更可能與祭祀有關，是一種禮器」^⑪。再據王樹明先生到陵陽河遺址的實地調查，認為陶尊上「」這一刻劃符號，是當地日出、山峰景物的摹畫^⑫。因此，我們同意陶尊上的刻劃符號，與祭祀太陽有關，它屬於圖形符號，而不是文字。

商代的甲骨文，並不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因為它已是相當成熟、體系完備的文字。在它之前，文字的產生，必然要經過一個孕育、演進、成熟的漫長歷史過程。這個過程的開端，應從何時算起，我們認為，既不是仰韶文化時代，也不是大汶口文化時代，而是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晚期，即相當於古史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和夏代初期。

從文字實物資料上來看，花園村客省莊二期文化（即陵西龍山文化）遺址出土的這批獸骨刻劃文字，就是一個有力的佐證。其中的「大」、「萬」、「元」已是原始文字。它既不同於幾條簡單的記事符號，也不同於形象逼真的圖形符號。它處於陶文、甲骨文之間，開創了在獸骨上進行刻劃的先河。另外，在河南省登封縣王城崗遺址出土的碗、鉢、豆、甗等陶器上，也發現了一些文字，其中有一個字「」。據李先登先生考證說：「這個字的形體結構與商代甲骨文𠂔字、西周金文𠂔字等相似。這個字是由兩部分組成，像兩手有所執持，可能是個「共」字」^⑬。它的時代也屬龍山時代的晚期。據碳14年代測定，距今約四千多年，相當於文獻記載的夏代初期。儘管龍山時代的文字實物資料，目前發現不多，但這些決非孤證。它已是最早的原始文字，是毋庸置疑的。嚴文明先生推斷說：「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已有許多記事的符號或原始文字，龍山時代應該有更加進步、更加成體系的文字資料，但現在只發現了零星的幾個刻劃記號」。我們相信，隨着考古工作不斷深入地進展，這一時期的文字實物資料，將會不斷地被陸續發現的。

從社會生產力來看，龍山文化時代，人們學會了製造銅器，製陶業已普遍使用陶輪，農業耕作技術的改進，建築技術的提高等，因而社會生產力獲得迅速地發展，有了剩餘產品，私有財產擴大，貧富分

化，階級出現，國家產生。這時，奴隸主需要發號施令，驅使人民。人們需要進行商品交換，往來頻繁，整個社會需要文字，已是迫不及待的了。所以，文字就開始出現了。

從文字的創造者來看，文字是廣大勞動者創造的，決非出於一人之手。但是，文字的創造，離不開一批專職人員的整理、加工、修正、推廣。這批專職人員，就是當時社會上的巫師以及王室的卜人。史官。龍山時代的遺址，已經普遍出土卜骨，由此可知，一批脫離體力勞動的卜人、巫師也就相繼出現了。儘管龍山時代諸文化，甚至二里頭文化以及二里崗商文化，都在占卜的獸骨上未見刻劃文字，只有灼痕無錯，或有灼有錯。這可能是當時還不知道在卜骨上記載卜辭；或者是還不能輕而易舉地在卜骨上進行契刻。但並不能說明他們沒有使用文字，進行記事。另外，我國古代有「倉頡造字」的傳說：「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⑤。《荀子·解蔽篇》：「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如果認為文字是倉頡獨自創造的，顯然這是無稽之談。但是，這個傳說卻可以說明當時已有了象形文字，作為黃帝史官的倉頡，可能對早期的文字，做過一些整理、規範的工作罷了。他的這點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總而言之，從文字實物資料上來看；從當時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上來看；從文字創造過程中專職人員的出現上來看，我們認為，中國漢文字產生的時代，應在龍山時代晚期，即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及夏代初期，這是文字的萌芽時期。從夏初到商初，是文字的發展時期。到殷商後期，殷墟甲骨文出現，乃是文字的成熟時期。

第二、花園村遺址出土的獸骨刻劃文字，是中國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國有着燦爛悠久的歷史。可是長期以來，學術界對中國文明的起源，估計太遲，認為中國文明形成於商代。夏鼐先生說：「二里頭文化同較晚的文化相比較，是直接與二里崗文化，間接與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後繼的關係。所以，我們認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稱為文明，而又有中國文明的一些特徵。它如果不是中國文明的開始，也接近開始了」^⑥。日本著名的學者貝冢茂樹也認為，中國文明的形成時代，應在商代前期。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明時代的開端，也就是階級社會的起源。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一書中

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分為三個時代，即蒙昧時代、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主張人類社會從野蠻的高級階段經過文字的發明和應用，鐵器的使用，伴隨着國家和城市的出現，進入文明時代。

文字是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摩爾根認為文明時代「始於標音字母的發明和文字的使用」。恩格斯也認為正是「由於文字的發明及其應用於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①。我國漢文字的產生與國家的出現幾乎是同時的。在我國龍山文化晚期，由於已經出現了文字，發現了青銅器和城址（如河南登封縣王城崗和淮陽縣平糧台等），因此，我們認為，中國文明的開端，應該提前到龍山時代的晚期，即夏代初期。

近兩年來，考古界出現了「紅山文化是中國文明的新曙光」，「良渚文化是中國文明的前夜」等觀點，這些文化都還處在史前時期，根本不具備文明的標誌，像城市、文字、青銅器的產生。更談不上國家和階級社會的產生。

總之，根據中國漢文字的產生、青銅器的製造、城市的建立、國家的出現，這對研究中國文明的起源，都是重要的條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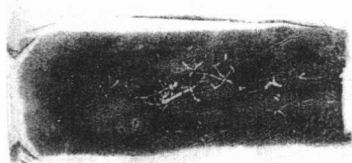
一九八八年五月初稿

注釋

- ①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辨證的發展》，《考古》一九七二年第一期。
- ② 于省吾：《關於古文字研究的若干問題》，《文物》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 ③ 李學勤：《重新估價中國古代文明》，《人文雜誌》一九八二年專刊（先秦史論文集）。
- ④ 唐蘭：《從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國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報》一九七七年七月十四日。
- ⑤ 裘錫圭：《漢字形成問題的初步探索》，《中國語文》一九七八年第三期。
- ⑥ 徐中舒、唐嘉弘：《關於夏代文字問題》，《夏史論叢》齊魯書社，一九八五年。
- ⑦ 孫華：《關於漢文字形成的幾個問題》，油印稿，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五屆年會論文。
- ⑧ 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 ⑨ 李先登：《試論中國文字之起源》，《天津師大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 ⑩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北京。
- ⑪ 邵望平：《遠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九期。
- ⑫ 王樹明：《論陶尊文字「烜」與「炅」》，《古文字論集》第一集（《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
- ⑬ 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嗎》，《文史知識》一九八五年第七期。
- ⑭ 嚴文明：《龍山文化和龍山時代》，《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 ⑮ 許慎：《說文解字·序》。
- ⑯ 夏鼐：《中國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 ⑰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T18H1:01



T18H1:02



T17H5:03



T17H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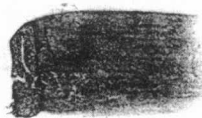
T20H1:05



T20H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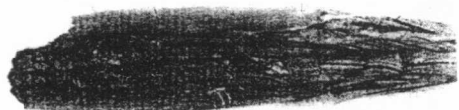
T19H7:08



T19H3:12



T19H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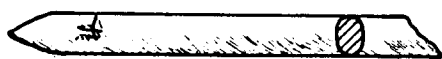


T19H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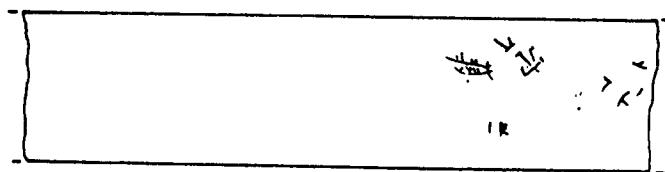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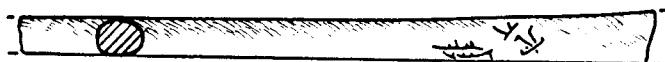


T18H4:11

獸骨刻劃文字拓圖



01 骨筭



02 骨筭



03 肋骨



04 骨片



08 骨片

獸骨刻劃文字綫圖

山東莒縣陵陽河陶文的發現與考釋

蘇兆慶

莒縣陵陽河遺址所發現陶尊上的文字，引起國內外有關研究者的注意。尤其在國內歷史、考古、古文字、天文、美術等學界引起更大的反響。不少專家學者紛紛撰文，新說迭出。筆者親自參加了陶文的發現和清理，本文擬就陶文的發現情況作一概述，並對有關文字進行考釋，以求得教正。

目前，山東莒縣以有陵陽河為中心的朱家村、杭頭三處遺址出土了陶文單字十一個，複字二十個。陵陽河遺址位於莒城東南十公里的陵陽鄉陵陽村之東部。東鄰寺園山，西為平原，南靠厲家莊，北依大河北村，陵陽河由東向西流經遺址北部。遺址東西長二百米，南北寬三百米，總面積約六萬平方米。是一片近嶺的高台地。土質為黃褐色。文化層厚一米左右，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遺存，也有龍山文化、岳石文化的灰坑、陶片出現。遺址為一九六〇年發現，一九六三年首次試掘，一九七九年復進行大規模發掘，清理墓葬四十餘座，出土陶文有「」「」「」「」「」「」「」「」「」「」等十三個。

大朱家村遺址在莒城東北八公里處，南距陵陽河遺址八公里。遺址東距屋樓崗二公里，西面皆為平原。朱家村河自東向西流經遺址南部，東鄰朱家村，西靠何家村，北為寬闊的平原，其遺址東西長三百米，南北寬一百五十米，總面積約為四萬五千平方米。土質為黃褐色，文化層厚者一米二〇，文化面貌與陵陽河遺址相同，但無龍山、岳石文化器物發現。一九六四年發現，一九七九年進行發掘，清理墓葬四十五座，出土陶文「」「」「」「」「」「」等五個。

杭頭遺址在莒城東南八公里處，杭頭村東一公里處。東距陵陽河遺址二公里。遺址為龜形地，四周皆為平原，東西長一百米，南北寬二百五十米，總面積約為二萬五千平方米。土質為黃褐土，文化層厚一米二〇。一九八三年發現並試掘，清理墓葬四座，灰坑六個，出土陶文「」「」等共兩個。其文化

面貌比陵陽河遺址還要晚些，已近龍山早期，距今四千六百年前後。

三個遺址所發現的陶文有的完全相同，有的近似，也有的完全不同。其中必有內在的、規律性的聯繫。就其用途而言還應該是一致的。陶文的出現，說明了當時不僅有了記錄天象的要求，而且已見諸於文字。陶文的出現，說明社會上已產生了既能祭天、觀天象，又能刻畫文字的知識階層。所見之陶文均刻在灰陶大口尊上，這種灰陶尊造型別緻，平折口沿，上部為筒形，腹下漸收為尖底，成盆形，器身飾藍紋，器高一般在五十五釐米，腹周一百釐米左右。陶文刻在大口尊的胸部，大口尊在隨葬時，安放在墓主人的頭部左側和足下（圖1.2），像是已約定成俗。大口尊這個器物的隨葬與安放，反映了一定的等級觀念。如果大口尊這個器物是當時人們的日常生活用具，那就應在大中小墓中均有隨葬，事實不然，凡隨葬大口尊的墓，都是大中型墓，目前尚未發現小墓中有大口尊隨葬，而個別大墓裏還隨葬兩個，這就顯示了墓主人的顯赫身勢。講清陶尊的用途，對陶文的研探是會有幫助的。陶文的發現為歷史、考古和古文字等學界所矚目，像當年發現甲骨文一樣重視，在古文字史上揭開了新篇章，文字是一個民族語言的反映，是民族文化高度發展的象徵，是人類由蒙昧進入文明的重要標誌。從陶文字體工整、嚴謹和刻在灰陶尊上的統一部位來看，它已不是萌芽階段了，而是經過長期的醞釀才產生的，是東夷文化的典型，是遠古文化的火花。①

東夷是居住在我國東部的古代民族。據文獻記載：夷有九種，它是一個很大的族系，東夷人分佈在今山東、河南東部、江蘇北部和黃淮河中下游廣大一帶，是文化發展較早，文化水平較高的古代民族。由於東夷民族分佈的地區與大汶口文化發現地區十分一致，筆者認為：大汶口文化就是東夷民族文化的代表。

東夷民族，史書上有不少記載。蚩尤就是東夷民族記載最早的英雄，據《逸周書》記，他曾與黃帝爭奪帝位而大戰於涿鹿，蚩尤之後東夷民族的另一個英雄是少昊，他受黃帝之命主管東夷並制定了曆法，他以鳥名官。《左傳》昭公十七年記鄭子講述以鳥名官的制度：「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中，鵙鳩氏司馬也，鵙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鸛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